

博物館如何再現「歷史」：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收藏與展示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組

摘要

定義上，博物館是收藏文物、展示歷史的機構。但是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探討在不同的時期其收藏與展示是如何以及為何改變的「生命史」。回顧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收藏，各類藏品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消長不一的情形，這反映出博物館在不同時期角色定位的轉變。從 1908 至 1915 年，以自然與產業標本為主的收藏強調「臺灣自然資源的獨特與珍貴」與「自然資源可被人類馴化的潛力」。1915 年至 1920 年以「商品」的展示強調加工物的交換性。1920 年至 1945 年，「自然物」全面被「文化產物」所取代，關注的焦點改為「統治的文化技術」。歷史與「蕃族」乃於 1920 年代後成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兩大主流，但兩者卻運用了相當不同的展示策略，只是在目的上卻也是殊途同歸：呈現日本殖民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在「蕃族」展示的部分，採用一種「文化標本」式的陳列，反映出當時殖民地人類學所發展出的一種特殊的觀看「他者」的觀點，而其策略是「異化」：強調原住民與我群之間的差異。在歷史展示中則運用「同化」的策略，以不同的方式強調日本與臺灣歷史的淵源，並排除其他族群在臺灣歷史中的扮演的角色，導致了 1930 年後臺灣漢人風俗品退出歷史展示而移置「土俗部」。因此，一部臺灣總督府博物收藏與展示的生命史就是一部「他者是如何被我群所建構，過去是如何被現在所創造」的歷史。

一、歷史過程中的博物館收藏與展示

就其原始的定義來說，博物館是收藏「物品」的場所。但是，很明顯地，不是所有物品都可被、會被博物館所收藏。一個社會有各形各樣的物品，但其中只有部分被認為是適於收藏在博物館中成為「藏品」。一件物品被收入博物館中成為藏品，可能基於不同的理由：或是基於其稀有性（如皇家博物館收藏的「珍寶」）、藝術性（如美術館收藏的藝術作品）、紀念性（如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歷史文物）、文化上及科學上的代表性（如人類學及自然史博物館收藏的「標本」）。但是，不論基於哪種理由，造成一件「物品」成為博物館中的「藏品」都涉及一種文化的價值判斷：它們之所以被收藏是因為（某個時代某個社群）認為它們是

適於且值得被珍視、被保存、被研究、被展示。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某一個博物館可能會在不同的時期強調不同的收藏；同樣的物品可能在一個時期被視為適於博物館收藏，在另外的時期則非。因此，考察歷史上某個特定的博物館為何選擇去保存、珍視某類特定的藏品（或者選擇不去保存、珍視某類特定的藏品），常能告訴我們不只是該博物館，同時是該博物館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重要的訊息。

同樣地，以其另一種的定義而言，博物館也是「展示」（藏品）的場所。但是，顯然地，不是所有藏品都經常地處於博物館的展示狀態中。博物館的「藏品」要成為某個展示中的「展品」常常經過有目的性的選擇與組合。以人類的語言作為比喻，博物館「展示」與「藏品」間的關係，有如語言中的「語句」與「詞彙」的關係，透過有意識對「詞彙」（藏品）的選擇與組合，才構成了某特定「語句」（展示的主題）。同時，我們不難發現，同樣的藏品可能在一個時代被視為適於特定主題的展品，在另外的時代則非。而同一個博物館也可能在不同的時期對同一類藏品做出不同性質的展示。因此，決定某件「藏品」是否成為某項展示的「展品」的因素，不在於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固定不變的內在關聯，而是取決於歷史的情境。

以上的觀點強調了，即使在一個號稱「超越時間」（timeless）的機構——博物館中，「物品」、「藏品」與「展品」間的關係絕非是固定而恆久不變的。藉著探討「博物館物品」（museum objects）在不同時代如何被收藏、被利用與被展示的歷史，可以透露出不只是該博物館，同時是該博物館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重要的訊息。本文的目的，即以上述的角度，觀察並探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08-1945）藏品性質上的變遷，以及各類藏品在展示脈絡中的變化。如果說「博物館」，就像「人」一樣，也會經歷「生命」的不同階段，則本文就是描述並探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其收藏與展示如何及因何改變的歷史。

二、從「自然標本」到「文化產物」

「博物院，上圓穹而下方址，甚宏麗。院外即臺北新公園，臺沼掩映，甚是奇觀。院內有樓二層，俱鋪綠文瓷瓦。觀者脫履於門，方得入；門內多備草履，以供遊者之用。下層之中間一室不陳列何物，有銅像二，頗巍峨；一為前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一為前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也。其旁陳列各色人種之模型及各業人民之生活狀態並中國之偶像如天神、土地、文昌、城隍等；開山偉人鄭成功像，亦在焉。他如陸地動物、海底動物及各種礦物，搜羅甚富，俱陳列其間。所列本島礦產，水晶特多，金、銀、銅礦亦有。上層則陳列工藝物、農作甚富，臺灣所產之烏龍茶為極為有名者。余此時正如入鄧林而羨名材、遊玄圃而見積

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矣；院雖不甚廣，而參觀之時間亦甚短故也。內有吾國亡清之衣冠、「文魁」、「貢元」之匾額；壁間掛有某之父母神像，戴幘帽、穿袍套；在彼以為新世界所無者，故羅列之。然吾人觀之，不覺恥憤交集矣。有臺灣生番之塑像、衣飾、玩物、用具、亦屬見所未見。生番為臺灣之野蠻人，深居山中；性凶悍，嘗殺人而食。男則頭插羽毛、耳穿竹管，女則以茅莖與紅布共編成笠戴於頂，頸繞長珠如菩提，以布圍腰，不著衣服而以雜色布屑文身，但此為未開化者。今則有少數已開化者亦入學校為學生，印有影片，其服飾全不類此，且其成績亦有可觀；足見教育之為功大也」。¹

上段的引文，出自於一位名叫劉範徵的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學生。他與同校同學在 1915 年 12 月 4 日至 15 日間，從福州來臺旅行考察，並記下此行的見聞與心得。上段文字係錄自其中 12 月 7 日參觀台北新公園中一座「博物院」之心得。文中所描述的那座「上圓穹而下方址」、「俱鋪綠文瓷瓦」的博物院，就是當時才遷居新館尚不及四個月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²

這位來自福州的中國學生劉範徵可能並不知道，他所看到的是一個正值「黃金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如果在歷史上能夠選擇一個參觀「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最佳年份，那無疑應該就是 1915 年的年末了。西元 1915 年 8 月 20 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館舍從過去借用因廢止彩票（獎券）而閒置的「彩票局大樓」，遷入新建的館舍，也就是為紀念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而興築的「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先不論其陳列的內容，從其外觀空間給予人的感受而言，這座新落成的「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座落在一個「臺沼掩映」的公園中，運用了一種與當時中國建築風格絕然迥異的西洋古典的建築樣式，如圓頂(dome)、山頭 (pediment)、列柱(colonnades)，入口大廳左右兩側的「西式神龕」中巍然樹立兩尊總督與民政長官的銅像，大廳地面上鋪著由日本進口大理石組成的拼花圖案（綠文瓷瓦），觀眾入內參觀尚須脫鞋換上草履。嶄新的建築、宏偉壯麗的外觀與內部空間，傳達出一種迥異於中國傳統的西方理性、文明的經驗（當然也有背後支持、推動這種理性與文明經驗的政權之正當性），令這群來臺灣考察的中國學生感到印象深刻。

1915 年末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不只在建築外觀上令人一新耳目，館中的典藏品也相應大幅地增加。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 1908 年初開館時，計有典藏品 12,723

¹ 劉範徵，〈臺灣旅行記（二）〉，文見《臺灣旅行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211 種，1996；1965 原刊），頁 70-71。

²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全名在日治時代因隸屬不同的主管單位而有不同的名稱，1908 年初成稱立時稱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在 1920 年，因改隸內務局，全銜遂改為「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附屬博物館」。至 1926 年，博物館又由內務局改隸於文教局，故其全銜也改為「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附屬博物館」。另外，在 1915 年遷入新公園中的「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曾改稱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但在時人的文章中，多半仍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或「臺北博物館」相稱。以下本文將概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相稱。

件，經過 7 年的擴增，到了 1915 年新館開放時，典藏品此時已增至 23,268 件，較創建時幾乎增加了一倍（參見表一）。同時，不僅數量暴增，而且種類繁多，其中包括了臺灣的動物、植物、地質礦物、「蕃人」、歷史、民俗工藝、農、林、漁業，以及貿易，從自然到人文，從歷史工藝到產業經濟，無所不包，故無怪乎劉範徵會發出「如入鄧林而羨名材、遊玄圃而見積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矣」的感嘆了。

然而，在美輪美奐建築與豐富展藏品的背後，劉範徵等人此行所未能察覺到的則是博物館內部的一些變化。這些變化看似細微，卻是導致日後更大轉變的契機。首先，在 1915 年 8 月 20 日博物館開館當日，自 1908 年成立以來便主導博物館營運方向的首任館長川上瀧彌卻因準備開館過勞而病逝。川上瀧彌的病逝使得他在任內積極推動的標本蒐集與調查事業面臨無以為繼的情況。其次，新館的典藏品雖較 1908 年大幅增加，但若仔細比較 1908 年與 1915 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各類藏品之數量，不難可以發現並不是所有類別的藏品都有增加，某些類別的藏品，如植物、農業、礦業，甚至出現數量相當明顯的減少；而在數量上真正顯著增加的則有動物、地質、人類、歷史與工藝及貿易類。事實上，如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全部時期來觀察，可以發現更明顯的消長趨勢：有些類別的藏品（如 1920 年以後的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藝、貿易類藏品）完全消失了；有新類別的藏品（如 1920 年以後的華南\南洋類與雜類）開始出現；即使一直存在的類別，也僅有歷史類保持逐年遞增的穩定成長，人類、動物與地質類則呈現逐年增減不一的情形，而植物類更表現出時有時無的情形。為何不同類別的藏品數量上會有這種增減不一的消長情形是值得深究的一個問題。

表一：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年館藏品類別及數量統計³

年代	地質 (地 文)礦 物	植物	動物	人類(蕃 族、高砂 族)	歷史 (教 育)	農業	林業	水產	礦業	工藝 (工 業)	貿易	華南 (南 支) 南洋	雜	合計
1908	906	3,998	3,722	712	100	1,811	455	179	372	152	316			12,723
1910	—	—	—	—	—	—	—	—	—	—	—			19,000
1911	—	—	—	—	—	—	—	—	—	—	—			20,000
1912	—	—	—	—	—	—	—	—	—	—	—			23,970
1913	—	—	—	—	—	—	—	—	—	—	—			24,204
1914	1,618	1,906	12,578	1,903	1,042	800	621	92	7	2,829				23,396
1915	1,623	1,906	12,619	1,932	1,044	719	507	93	7	2,818				23,268
1916	1,626	1,906	12,619	1,932	1,050	741	507	93	7	2,819				23,300
1917	1,260	1,906	4,105	1,650	1,085	181	120	102	44	381				10,834
1918	1,285	1,906	4,115	1,649	1,181	182	120	93	44	374				10,949
1919	1,285	1,906	4,115	1,649	1,181	182	120	93	44	374				10,949

³ 本表引自歐陽盛芝、李子寧，〈博物館的研究：一個歷史的回顧〉（1999），頁 117。

1920	1,329	—	4,092	1,663	1,408	119	86	90	—	295			9,082	
1921	1,329	608	4,099	1,686	1,551								9,273	
1922	1,329	—	4,246	1,742	1,684							569	9,570	
1923	1,435	—	4,180	1,441	1,790							337	422	9,605
1924	1,438	—	2,357	1,419	1,790							354	249	7,607
1925	1,263	—	2,392	1,427	1,786							325	280	7,473
1926	1,276	—	2,393	1,418	1,787							473	273	7,620
1927	1,276	—	2,391	1,435	1,800							473	273	7,648
1928	1,276	—	2,412	1,468	1,801							473	273	7,703
1929	1,276	—	2,481	1,462	1,817							771	383	8,190
1930	1,794	—	2,512	1,647	2,266							828	366	9,413
1931	1,801	—	2,461	1,637	2,455							1,126	376	9,856
1932	1,823	—	2,479	1,656	2,496							1,126	376	9,956
1933	2,017	350	2,809	3,049	2,646							1,149	339	12,359
1934	2,134	382	3,437	3,071	2,692							1,149	341	13,206
1935	2,526	389	3,440	3,068	2,873							1,156	286	13,738
1936	2,202	391	3,479	3,077	2,825							1,188	286	13,448
1937	2,225	448	3,516	3,074	2,876							1,190	286	13,615
1938	2,267	4,996		3,162	2,910							1,229	180	14,744
1939	—	—	—	—	—							—	—	15,183
1940	—	—	—	—	—							—	—	14,871
1941	—	—	—	—	—							—	—	14,923
1942	2,330	5,024		3,194	2,935							1,239	201	14,923
1943	2,330	5,024		3,194	2,935							1,239	201	14,923

註：斜線格表示並無該類標本；—表示缺該項統計數字。

1908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設立的直接動機，是為了慶祝該年臺灣南北縱貫線鐵路的全線通車，原本總督府是打算配合縱貫鐵路全線通車的儀式，並迎接前來主持通車典禮的日本閑院宮載仁親王之來訪，舉辦一次以介紹臺灣物產與產業為主的臨時展覽會。後來，雖然這個臨時物產展覽會的計畫更改為直接成立博物館⁴，但介紹臺灣特殊的物產與物產相關產業之情形的目的並沒有改變，而主導博物館初期開館與營運的行政單位也一直由負責物產與自然資源調查與開發的殖產局來擔任。這情形使得這一時期⁵的臺灣總督府博物在藏品上相當偏重於自然類（地質、動物與植物）與產業類（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藝、貿易類）。以表一所列1908年開館時藏品的數量就可得知，自然類藏品共計8626件，佔所有藏品總數的67.8%，而產業類藏品共計有3285件，佔所有藏品總數的25.8%。同時，從開館當時報紙媒體一面倒的報導博物館陳列的各種「有用植物」與產業模型的情形⁶來看，也可以看出開館初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對「殖產興業」上面的強調。

然而，到了1915至1920年間，上述的情形似乎已有所改變。首先，作為

⁴森丑之助(森丙牛生)，〈臺北博物館 思 出〉(1936)。

⁵指1908至1920年間的總督府博物館殖產局時期。

⁶關於1908開館時報紙對博物館的報導分析，可參見李尚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研究1908-1935》(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5)，頁51-52。

前期重點的產業類藏品逐年減少，到了 1920 年後遂完全消失於博物館的藏品之列。產業類藏品消失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1917 年 5 月「總督府商品陳列館」在臺北市南門町的重新開館⁷，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產業類藏品遂全數移交給復館後的總督府商品陳列館。但是，從長期的歷史趨勢上來看，產業類藏品從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品範圍中消失也反映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本身的定位與性質的轉變。總督府雖然在 1908 年 5 月 24 日頒佈第八十三號訓令，明述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職掌為「掌理蒐集陳列有關本島學術、技藝及產業所需之標本及參考品，以供公眾閱覽之事務」。但是對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應該強調「學術」面（科學調查研究）或是「技藝及產業」面（應用科學或商品）在當時博物館相關主事者的眼中卻有不同的看法。在 1915 年以前，這兩項範疇，至少在執行上，可以說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如森丑之助就曾利用當時任殖產局技師的首任館長川上瀧彌之有用植物調查計畫的名義與經費，前往新高山進行高山植物之採集⁸。因此，在此時期的自然類標本與產業類藏品都維持相當高的藏品比重。但在 1915 年開館當日首任的館長川上瀧彌因過勞而去世之後，殖產局兼重科學調查研究與應用的形勢不再。就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開館元老，著名的昆蟲學家素木得一所說：「博物館事務移館至（殖產局）商工課，館長由商工課長兼任……，無形中陳列樣式化為商品陳列方式，出現遠離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傾向」⁹。到了 1920 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轉隸內務局學務課，產業類藏品全數移交給復館後的總督府商品陳列館，學術面（自然史）才定於一尊地正式成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主軸。

其次，經過 1915 至 1920 年間定位的擺盪，在 1920 年後已確立自然史收藏主軸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其動物與植物兩大部門，特別是植物部門的收藏，卻明顯呈現出萎縮的趨勢。為何如此？矛盾的是，造成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 1920 年後動、植物收藏明顯遜於殖產局時期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導致它最終擺脫產業類藏品軸而定於「自然史」主軸的同一個原因：由殖產局改隸內務局學務課。脫離殖產局的主導，固然使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擺脫了產業類藏品與商品式陳列之譏，但也切斷了前期收藏得以迅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殖產局的人力與經費。這一點可以從後來館員的回憶中得到印證，如松倉鐵藏在其回憶中就曾如此表示¹⁰。同時，脫離殖產局主導後，不僅藏品因缺乏經費與人力而無由增加，舊

⁷ 「總督府商品陳列館」原成立於 1899 年，後來因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開館，藏品因而移至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故 1899 年的「總督府商品陳列館」也可說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前身。

⁸ 森丑之助(森丙牛生)，〈臺北博物館 思 出〉(1936)。

⁹ 素木得一，〈博物館創設當時 顧 〉(1939)。

¹⁰ 參見松倉鐵藏，〈博物館勤務當時 思 出 希望〉(1939)。

有的藏品也因缺乏保存條件與有識人士而發生「被當垃圾處理掉」¹¹的情形。然則，為何臺灣總督府博物物的行政隸屬要在 1920 年後由殖產局移出而至內務局及後來的文教局？

1920 年的 10 月 9 日，總督府發佈「告示第一百七十八號」，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由殖產局改隸於內務局學務課，館長則由學務課長兼任。此後至 1945 年，館長與行政隸屬更隨著總督府文官制度的變遷而頻繁地更動（見表二）。更動雖頻繁，但大體而言，1920 年後的行政更迭皆不出於教育的部門，明顯有別於前期的殖產部門。因此，這代表的意義很明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自此開始被視為是教育，更精確來說是社會教育的一環。

表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任館長及行政隸屬¹²

單位	任期	姓名	職屬
殖產局	1908-1911	川上瀧彌	農務課勤務兼館長，技師
	1912	立川連	商工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13-1915	川上瀧彌	農務課勤務兼館長，技師
	1916-1920	田阪千助	商工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內務局	1921-1925	生駒高常	學務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26		文教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27	坂口主稅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文教局	1928	竹下豐次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29-1930	野口敏治	學務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31-1932	江藤昌之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33	高橋秀人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34-1936	王野代治郎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37-1939	慶谷隆夫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40	立川義男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41	堀克夫	社會課長兼館長，事務官
	1942		社會課長兼館長，書記官
	1943		
	1944	柴山峰登	社會課長兼館長，書記官
	1945	松山儀藏	文教局局長兼館長

¹¹ 素木得一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週年紀念座談會上發言，參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座談會（紀錄）〉（1939），頁 395

¹² 本表修改自歐陽盛芝、李子寧，〈博物館的研究：一個歷史的回顧〉（1999），頁 135。

從當時歷史的背景上來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 1920 年前後由殖產局強調自然資源與物產或商品的收藏展示機構被重新定位成爲社會教育的機關也顯示出當時日本治臺政策已面臨一些結構性的改變。一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各國各殖民地開始興起一股民族自覺的風潮，日本國內也興起了強調民主自由的思潮。在臺灣方面，1912 至 1915 年間陸續爆發了數次大規模的漢人武裝反抗運動，自 1910 年開始的佐久間總督「五年理番計畫」在大規模的討伐行動之餘也引發了原住民更大的反抗。另外一方面，以臺灣作爲日本向華南及南洋（東南亞）地區擴張勢力的跳板的「南進政策」也在此時逐漸具體化。種種島內外的新局面，使得總督府不得不重新調整其治臺的基本政策。1918 年以後，以改造殖民地人民成爲「真正日本人」的「同化主義」逐漸成爲日本治臺的一項基本方針。推動「同化主義」最直接的手段則是透過教育，但教育最終的目的不在於提升治下人民的知識水準，而在於確保日本統治的支配性。

在此背景之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被納入教育體系的意圖就很明顯了。如果說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教化（同化），而非啓蒙；其對象在於「被統治的人」，而非「被統治的地」，則博物館「人文類」的收藏與展示凌駕於「自然類」之上也是遲早之事了。因此，我們從表一中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自 1915 年以降至 1945 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自然類」的收藏不僅無法與殖產局時期相比擬，甚至出現大幅縮減的情形。但「人文類」的收藏，如歷史類與人類（番族）的藏品不只大致呈現逐年穩定的增長，更在 1920 年後新增了「南支南洋」（華南南洋）的類別。至日本統治最後一年的 1945 年，總計上述三類人文之收藏數量已高達 7368 件，佔該年臺灣總督府博物所有藏品的 49.4%，而在 1908 年初開館時上述兩類（歷史與番族）藏品僅約佔所有藏品的 6%。

總之，如果以臺灣總督府博物收藏的生命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時期對不同性質藏品有著不同型式的強調：從 1908 至 1915 年的殖產局前期，是「自然標本」與「自然加工物」（產業類藏品）擅場的時期，強調的是「臺灣自然資源的獨特與珍貴」與「自然資源可被人類馴化的潛力」。1915 年至 1920 年殖產局後期（商工課時期）是「商品」（commodity）的時期，著重的不再是臺灣自然資源的可利用性，而是自然加工物的交換性。最後，1920 年至 1945 年，「自然物」全面被「文化產物」所取代，關注的主題不再是「關於自然的科學」—強調人類如何發現、理解與利用自然的知識與技術，而是「統治的文化技術」—如何藉由「文化產物」的收藏與展示以建構符合統治需要的文化論述。這也是本文下面將進一步討論的主題。

三、從「文化觀光」到「文化標本」

自 1908 年臺灣總督府博物成立以來，「番族」（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一直都是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重點。對於一般的觀眾而言，如前節所引劉範徵描述之「深居山中；性凶悍，嘗殺人而食。男則頭插羽毛、耳穿竹管，女則以茅莖與紅布共編成笠戴於頂，頸繞長珠如菩提，以布圍腰，不著衣服而以雜色布屑文身」的「奇風異俗」形象，當頗能投合一般觀光客獵奇好異的心理。對於研究者而言，外界對原住民文化與族群的缺乏瞭解，恰也提供了一個彌足珍貴的「學術調查處女地」。而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又有什麼能比將其治下如此「未開化」的民族予以「文明化」更能展現為政者的教化之功？無怪乎在劉範徵觀後心得中才會出現「足見教育之為功大也」之語。

事實上，將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視為「文化觀光」的賣點、（人類學）知識系統下的「文化標本」，與彰顯「文明教化之功」的例證，可說是主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對臺灣原住民文化展示三種最主要的觀點。同時，透過對藏品有目的性的選擇與組合，以及各種展示道具，如模型、圖表與文字解說的綜合運用，營造出一種特殊的博物館展示情境，而上述三種觀點所形成的論述就在其中不僅互為表裡，而且相互襯托。以下即以上述三項觀點檢視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對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展示。

對於當時一般的觀眾而言，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番族室」陳列最有吸引力的恐怕不是那些分族置放在大型陳列櫃中琳瑯滿目的傳統服飾與器物，而是栩栩如生的人身模型。使用人造模型以加強展示效果的手法在 1908 年博物館開館時即已運用，但多用於產業或建築之展示，如腦寮模型、鵝鑾鼻燈塔、鹽田模型、與金瓜石金山模型等，其中金瓜石金山模型還因為製作之精巧而獲得報紙的大力稱揚，由此可見當時臺灣觀眾對模型的展示有相當的喜好。但當時在原住民的陳列部分似乎只有番社的模型。博物館使用人身模型於原住民的展示應是始自於 1915 年後的「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如與劉範徵同行的另一位學生謝明珂就在心得中提到：「最有趣者，則番族室之生番模型。生番裸居，慶賀則以布圍腰。男女皆穿耳、貫以竹節。嗜煙。出則持矛，喜殺人；貌亦猙獰可畏」¹³。以謝生的描述，比對圖一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原住民模型明信片照片，幾乎就可以說謝生對原住民的印象完全就是根據展示模型而得來。只是這位謝同學根據模型所得來的原住民印象仍以裸居、嗜殺、猙獰可畏等強調原住民「未開化」或「野蠻」特質的負面意象居多。

¹³謝明珂，〈臺灣旅行記（三）〉，文見《臺灣旅行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211 種，1996；1965 原刊），頁 70-71。

圖一：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發行明信片中的泰雅族原住民模型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番族」陳列中隱含對原住民「未開化」、「野蠻」、「原始」及「落後」等負面意象的強調固然可以滿足一般觀光客對異族文化的想像，而成為博物館吸引觀眾的一項賣點，但是對同樣意象的反相操作也可以對照彰顯出殖民政府對「番族」的教化之功與治理之績。在這一方面，可以從劉範徵參觀博物館的心得中很清楚地看出。在一段描述「生番」的「原始」風俗之後，他又表示：「但此為未開化者。今則有少數已開化者亦入學校為學生，印有影片，其服飾全不類此，且其成績亦有可觀；足見教育之為功大也」。此外，與劉範徵同行的另一位學生邱文鸞的參觀心得中也有類似的感想：「現番人中亦有入公學校及中學校者，其成績亦多可觀」。從兩人的描述與感想中，可以得知在當時（1915）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原住民陳列中，除了傳統服飾與器物與模型外，同時也展示出一些當時原住民受教育情形的照片（及說明？），與前者形成對照。

究竟這些照片的內容為何？其與傳統器用對照陳列之下又傳達何種訊息？我們可以從現今國立臺灣博物館接收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一批照片中得到當時展示的一些梗概。這一批原住民的照片，共計 78 張。每張照片尺寸約 50X40 公分，所有照片皆黏貼在一塊更大尺寸的厚紙板上，應是當時用於展示之用。仔細分析照片的內容，可以發現這批照片依其主題大致可區分成三類：一是傳統聚落與地理景觀，二為傳統生活習俗，三則為日治時期的各種教育活動、警政交通設施（表三）。值得特別注意的為第三類照片，其內容包括稻作實驗作業、室外音樂教學、蕃童教育所教學、實驗農耕、工藝研習班、隘勇線、警察設施、腦寮設施與涉溪便橋等交通設施。其內容多為強調現代教育、治理與交通設施。用以

對照其他傳統的形象形成一種鮮明的昔日/今日、傳統/現代、未開化/開化的對比。

表三：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日治時期原住民活動照片列表

編號	分類	內容
AT3245-2	照片	馬蘭阿美族公學校生稻作實驗作業
AT3245-4	照片	泰雅族學童室外音樂教學
AT3245-5	照片	蕃童教育所教學
AT3245-7	照片	叭哩砂支廳隘勇監督所
AT3245-9	照片	太麻里蕃童教育所校舍及學生
AT3245-12	照片	隘勇線設施
AT3245-14	照片	泰雅族村落棧橋
AT3245-21	照片	警察設施補給
AT3245-25	照片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
AT3245-36	照片	蕃童教育所實驗農耕
AT3245-38	照片	太麻里公學校校舍及學生
AT3245-39	照片	腦寮設施
AT3245-59	照片	涉溪便橋
AT3245-70	照片	隘勇線警備設施
AT3245-78	照片	泰雅族男子工藝研習班工作一景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組

然而，除了深受一般觀眾喜愛的人身模型，以及作彰顯為政者教化之功的照片以外，無可否認臺灣總督府博館數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物質文化收藏還是作為人類學知識系統下的文化標本。在此，將其稱為「人類學知識系統下的文化標本」代表兩層意義。第一，在入藏時，這些藏品之所以被收藏，不是因為物件本身具有的美學特性或歷史意義，而是基於它們在當時人類學知識系統中所具有的意義。換句話說，是被當成足以代表或反映人類（原住民）文化特質的「標本」。其次，在展示時，這些物件被當成足以反映上述人類學知識及人類（原住民）文化特質的「物質證據」而予以呈現。因此，要了解臺灣總督府博館原住民物質收藏與展示的特性，就必須先瞭解當時產生這些「文化標本」的人類學知識背景。

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後，日本的學界及輿論界便屢屢強調臺灣做為學術調查處女地的價值，並積極鼓勵學者前往臺灣從事學術調查。同時，在另外一方面，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為了施政的需要，亦編列相當可觀的經費，以囑託、雇員、技手或技師等名義積極聘請專家學者來臺從事調查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的人類學調查，和同期展開的其他學科一樣，其背後動機都是兼具學術與（政策）應用的層面。以臺灣原住民來說，當時不論是基於學術立場或是統治需要都極為關鍵且亟需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分類原住民。

如 1895 年由伊能嘉矩與田代安定所發起成立的「臺灣人類學會」，在其暫行規則第三條中即明言：「從來臺灣雖然分人類為支那人（中國人）及熟蕃、生蕃三者，但是除支那人之外，僅目為異種人類，蓋不過從華夷之名，支那古來習慣的稱呼而已，故所謂熟蕃、生蕃不可直接作為學術上的名詞，必須依據今後的研究成果，才能決定種族為何」¹⁴。明確表示傳統漢人以熟蕃、生蕃為原住民之分類不可直接作為學術上的分類，必須進一步研究以決定種族。1900 年伊能嘉矩和粟野傳之丞受總督府之託進行全島實地調查後，出版「臺灣蕃人事情」一書，其中根據語言、風俗習慣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八個種族：Ataiyai、Vonum、Tsuou Supayowan、Tsarisen、Piyuma、Amis、Peipo。這是日治時期根據實地調查所提出第一個臺灣原住民分類架構，也是日後陸續提出各種分類的濫觴。在整個日治時期中，對原住民族群分類的問題一直在人類學研究中佔有關鍵的地位。

日治初期對原住民的人類學調查研究，除了族群分類的問題外，另一項重點就是對各族群傳統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的調查與研究。在這方面，尤以 1901 年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貢獻最鉅。「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之初原是以漢人的傳統習慣與法律制度為調查目標。1904 年因體認原住民的傳統風俗習慣與漢人有極大的差異，遂設立「蕃族科」，展開對原住民傳統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的調查，而其成果則是在 1913 至 1922 年間陸續出版的「蕃族調查報告書」與「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計 16 冊、8 冊「臺灣蕃族慣習研究」、以及森丑之助的「臺灣蕃族圖譜」2 冊與「臺灣蕃族誌」¹⁵，成果可謂豐碩。其中尤以強調各族群物質文化描述的 8 冊「蕃族調查報告書」（1913 至 1921 年間由佐山融吉編著）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最為相關。書中對各族群物質文化的分類架構實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物件功能分類之基礎。

上述日治初期對原住民的人類學調查研究，表面上來看似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間並無直接的關係。其人員除了森丑之助外亦缺乏重疊。然而，日治初期對原住民族群分類與傳統生活慣習的研究成果卻是構成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進行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展示背後的知識基礎。事實上，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正是將上述因學術與政治需要而展開的臺灣原住民人類學調查研究成果予以「通俗化」及「具體化」呈現的第一線機構。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是如何透過藏品的展示來呈現當時人類學知識架構下的「蕃族」？森丑之助，這位曾同時任職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人類學者在 1912 年發表的一篇「蕃族標本 陳列 就」¹⁶（關於蕃族標本的陳列）文章中，就提到他理想中的展示原則：「如何適切地陳列蕃族，此項設計

¹⁴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回臺灣人類學會〉（1896），頁 118。

¹⁵ 陳奇祿，〈「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臺灣土著研究〉（1974）。

¹⁶ 丙牛生（森丑之助），〈蕃族標本 陳列 就〉（1912），《台灣時報》31:3-6。

牽涉到陳列室的面積及經費，需要種種考量。但是對這些大多數的觀眾而言，一定要非常通俗的才行，不過若通俗但全是無意義的東西也是很可惜的，應該內容平易且配合各階級的人，讓大家都有興趣才好」。至於如何達到通俗又有意義，他也建議：「最簡單的方法是展示好幾張大的掛圖，以圖示顯示出地理及分布、體質、言語的概要」。其次，在掛圖旁，他也建議：「作出各個種族各一組的男女及小孩的型像。利用石膏或蠟、精細地作出和實體相同大小，其人體要以人類學上依據蕃人身體測定的指數為準，頭髮可用各種族的實物，皮膚的顏色，……配戴著實物的衣服及裝飾，並充分顯現出種族特徵的姿勢。一個種族放在一個展示櫃中，一旁放著主要的土俗品，這樣就可看出蕃人的容貌和風采，衣服裝飾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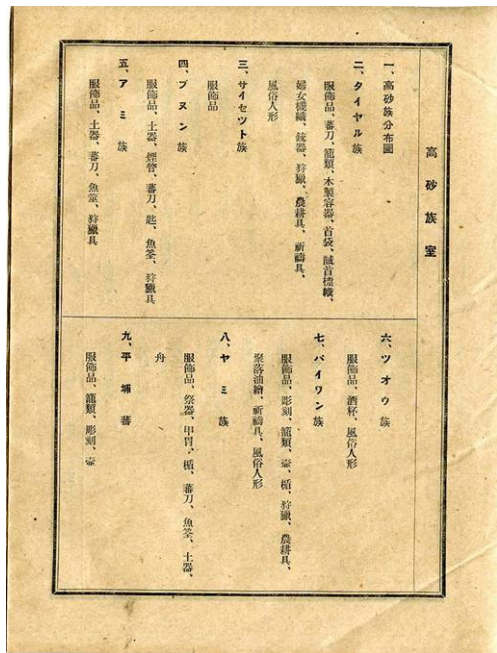
上述森氏提到對於「蕃族標本」的陳列構想，如以掛圖顯示地理分佈、依真人身材製作的人身模型、一個種族一個展示櫃放置土俗品等，可以說有相當程度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蕃族室」中被實現。圖二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昭和18年（1943）所發行的第四版「博物館案內」¹⁷（博物館簡介）中「高砂族室」的陳列概要。其內容雖簡略，但也可以明顯看出依族別分櫃陳列的方式，而其中第一項則為「高砂族分布圖」，以不同的顏色標示出各族群在地理上之分佈¹⁸（見圖三）。圖四、圖五則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發行的系列明信片中「蕃族室」陳列的情形。其中我們可以看出各族具有文化特色及代表性的器物（「文化標本」如圖中雅美族的船與瑁）是如何依族別被陳列於大型玻璃陳列櫃中。從以上說明文字、地圖、與「文化標本」的陳列，可以看出「科學性」的族群與器物分類是如何被「具體化」成為展示櫃中可觀賞的對象。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上述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原住民物質文化陳列，似乎並不能傳達森氏所強調的「通俗」、「有趣」之感，反而給人一種沈重、嚴肅的感覺。透過那些充斥在大型木框玻璃櫃中所陳列的琳琅滿目的各族標本，我們並不能得到很多關於那些實際使用或穿戴那些奇特服飾與器用之人群具體的印象，但也許這就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蕃族室」陳列的本質：它所呈現的不是具體的「他者」，而是一種獨特的觀看「他者」之方式：在一方面，藉著強調「他者」之異（野蠻原始或純真浪漫），以突顯「他者」與我群間的差異，並透過這種對「他者」差異的區辨以強調我群的特質（如文明、進步）。在另一方面，透過殖民地人類學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工具，如原住民族群分類的架構與物質文化的分類架構，以及博物館展示技術的運用，原住民不再是一群印象籠統的「生蕃」與「熟蕃」，而是七至九群擁有各自名稱與文化特質的「蕃族 s」。雖然依舊是非我族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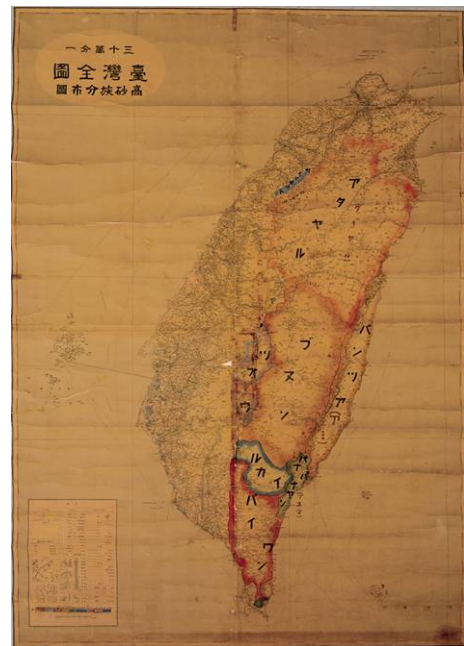
¹⁷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博物館案內》（第四版），1943。

¹⁸ 該圖現仍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中。

的「他者」，卻不再是「未開化」的「原始人」，而是整然有序地陳列於大型透明展示櫃中「可被理解」，也因此「可被治理」的「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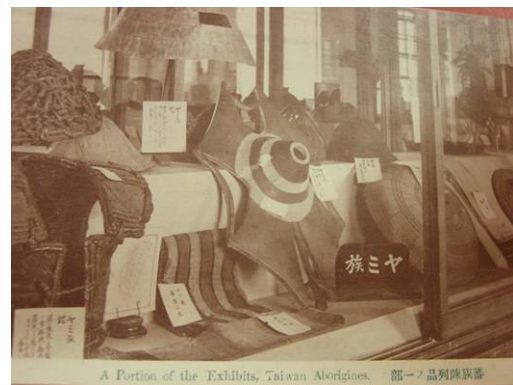
圖二：1943年「高砂族室」陳列



圖三：「高砂族分佈圖」



圖四：「蕃族室」陳列



圖五：「蕃族室」雅美族陳列櫃

三、歷史收藏與臺灣歷史的建構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類」收藏，與「蕃族類」收藏一樣，是從 1908 年開館時即出現的「元老級」藏品類別。但是，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36 年的歷史中，其歷史類收藏品的內容與歷史展示的方式卻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轉變。在進一步檢視這些轉變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所謂「歷史類藏品」的範圍與內涵做一番定義上的釐清。

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有藏品的分類之中，「歷史類藏品」無疑是其中內容最龐雜、也最難以界定範圍的藏品類別。博物館內其他的藏品類別，如地質、動物、植物、蕃族乃至南支南洋，都具有相當明確而固定的範圍與指涉，同時也通常都有一個與之直接相對應的常設性展示主題，如動、植物類收藏之於「動、植物陳列室」、「蕃族類」藏品之於「蕃族陳列室」、「地質類」之於「地質陳列室」、「南支南洋類」之於「南支南洋陳列室」。但是，歷史類藏品卻不然。作為一個博物館創立以來即已獨立的藏品類別，歷史類藏品不只內容龐雜難以界定，其陳列也經常跨越了一個以上的主題常設展示空間¹⁹。臺灣總督府博物歷史類藏品的陳列跨越了一個以上之主題展示空間這項事實顯示了，歷史類藏品在性質上的繁複多樣，以致於在展示上必須分開而陳列。但究竟歷史類藏品在內容上包括了什麼？表四係根據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15 年前後藏品清冊所整理出來的當時歷史類藏品列表。

表四：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15 年前後歷史類藏品列表²⁰

名稱	單位	數量	主要內容
貨幣標本	枚	191	中國古錢
掛軸	枚	24	廟內面圖、有應公、石敢當圖、
古文書	枚	17	臺灣民間古文書、清、日政府諭告與公文書、名人（如唐景崧、謝琬樵等）書法
紀念日附印	箇	14	
日露戰役戰利品	門	12	各式步槍、武器裝備
神像	箇	10	土地公、天上聖母、鄭成功、關帝等漢人寺廟神像
古印	箇	9	蕃社頭目印
圖書	冊	9	臺灣縣誌、府誌、廈門新音字典
日清戰役戰利品	挺	7	各式步槍、武器裝備

¹⁹ 以 1937 年（昭和 12 年）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從該年出版的「博物館案內（第三版）」（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1937）的平面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室」是位於二樓的東側，在一樓其東側為「臺灣土俗室」、西側為「南支南洋土俗室」。由該「博物館案內」的說明文字我們可以推知，在一樓東側的「臺灣土俗室」中，其展示內容除了「高砂族土俗品」（臺灣原住民器物）外，也包括了屬於歷史類藏品的「本島人土俗品」，即臺灣漢人民間器物。

²⁰ 本表係根據現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的一本「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品清冊」（手抄本）其中歷史類藏品資料而製。該清冊推斷年代約在 1915-1917 之間。本表中「名稱」、「單位」係依照該清冊中的用法。「數量」則為同名稱藏品加總後所得。「主要內容」則為筆者根據後期清冊之記載考訂後所加之說明。

戶口調查參加章	箇	5	
本島人風俗人形	組	5	一般平民如轎夫、苦力、道士造型模型
不用官印	箇	5	總督府各單位舊官印，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之印
建物模型	組	5	家屋模型、惜字亭模型、轅門模型城樓壁模型、石坊模型
骨牌	組	4	
旗	枚	4	振天府旗摹本、征台紀念旗
舟筏模型	箇	4	漁船、竹筏、戎克船模型
寫真	枚	3	總督、民政長官照片
馬蹄銀	箇	3	
印影	枚	2	
車模型	箇	2	漢人牛車模型
油繪	枚	2	阿里山油畫、王霖之畫
纏足模型	箇	1	
石碑	箇	1	蕃界碑
日本人種模型	組	1	
額面	面	1	新高山圖
飛行機	箇	1	
鑿	箇	1	
雕刻物	箇	1	雕刻獅子
著裝	筋	1	帶
甲冑	箇	1	日本武士甲冑
鎗	挺	1	台槍
台灣舊度量衡器	挺	1	
古太鼓	箇	1	漢人寺廟用鼓
福建巡撫部院賞	箇	1	
轎模型	箇	1	
銀製竹筏	箇	1	
銃	挺	1	

由表四的內容中，我們可以大致對當時的歷史類藏品究竟包括了什麼得到一個概略的印象。大體而言，當時的歷史類藏品主要包括兩個範疇的物品：其一，是臺灣民間的生活及宗教用具與模型，如錢幣、契字、神像、鼓、度量衡器，以及建築、舟車、人物的模型等；另外一類，則是與政府單位相關的物品，如諭告、各機關之印鑑、圖章、紀念性旗幟、政治人物照片、作為戰利品的武器裝備，以及圖書等。但總體而言，各類物品數量都不多，而且種類龐雜，彼此之間看不出明顯的關連性。這說明它們並不是經過有系統、有目的收藏的結果²¹。

這些種類複雜的藏品是以何種方式展出？在 1915 年來臺考察的中國學生之一謝鳴珂在其心得中曾如此提到：「藏古室；羅列清時州縣印誌、郡縣志錄、文書、契據、匾額、楹聯、神像等物，有孔子及蘇文忠、丘文莊、海介公三公畫像、鄭成功遺傳銅器攝影、劉永福發行郵票、劉銘傳時丈量尺。中華文物夷於蠻族，與巴黎博物院之圓明園遺器同一感慨矣。有一室，具列歷任日本臺灣總督及民政

²¹ 事實上，如在森丑之助回憶中就提到，在 1908 初開館時，歷史部門曾知會各地方政府，請求提供展品。可見當時大部分藏品，並不是主動去收集的，而是被動接收地方政府所提供，參見森丙牛生(森丑之助)，〈臺北博物館 思 出〉，《科學 臺灣》，4(2)，1936 (1925)，頁 56。

長攝影。……旁一玻璃匣，藏伯爵兒玉源太郎為陸軍中將時制服一套」²²。以謝生的印象，比照前述另一位學生劉範徵的說法，可以推斷當時的展示可能並沒有經過太多的組織（否則又怎會將將先秦的孔子、宋朝的蘇軾、明朝的海端、清末的丘逢甲，臺灣民間的神像、清代的志書共置一室），至少不是如「蕃族室」一樣，展示背後根據/反映著當時人類學對族群與物質文化分類的邏輯。但有意思的是，當兩位中國學生對陳列中「未開化」的「蕃族」感到有趣的同時，也不約而同對其漢人的展示有所感慨並「恥憤交集」。

如果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對原住民的展示是架構在日治初期以來人類學者對族群與物質文化「科學性」分類的成果上，那麼在 1920 年代由漢文學者尾崎秀真所提出的「臺灣古代史觀」可說是主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的第一套理論架構。過去討論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與收藏，常常強調前期森丑之助對博物館植物類與原住民類收藏或展示上的貢獻，卻忽略了中、後期尾崎秀真在歷史收藏與展示上的影響。事實上，尾崎秀真不只自開館初期即已參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門之展示規劃²³，1927 年任職總督府博物館囑託後更提倡「能動性博物館」²⁴之經營觀念，主動向民間借調文物舉辦臨時展覽會。歷年來由其捐贈²⁵或受託為博物館購買或採集²⁶的文物數量亦不佔少數。同時，更重要的，尾崎氏根據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收藏及其他史料²⁷所發展出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獨特觀點，縱然日後未能成為總督府對臺灣歷史的官方觀點，甚至也得不到同時代學者的認同，卻至少在 1920 年代後半實質影響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對臺灣歷史的展示與詮釋。

1925 年 3 月起至 10 月，尾崎秀真在《臺灣時報》連續發表 8 篇題名為〈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的文章，首度提出他對臺灣歷史發展與文化發展的觀點。次年 1926 年 11 月，又於《臺灣時報》發表〈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一文，更進一步闡述上述的觀點。在這幾篇文章中，尾崎秀真強調臺灣的歷史與文化發展不是只有文獻所記載的短短兩、三百年，而是可以用所謂「博物學」的方法與資料

²²謝鳴珂，〈臺灣旅行記（二）〉，文見《臺灣旅行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211 種，1996；1965 原刊），頁 88。

²³ 參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座談會記錄〉，頁 393，尾崎秀真之發言。

²⁴尾崎所謂「能動性博物館」主張，博物館的經營不應只是靜態地於玻璃櫃中陳列展品，更應要能主動反映「趣味」，如舉辦各種臨時展覽會，參見尾崎秀真，〈總督府博物館 思 出〉（1939）。

²⁵ 根據當時清冊所載，歷史類藏品中一些清代文人書畫、各地各地出土之石器、陶瓷器皆為尾崎秀真所「寄贈」。

²⁶ 如 1927 至 1929 年，尾崎秀真曾為佐久間財團至臺灣北部與東部蒐購平埔族與東部原住民之器物，詳見：李子寧、吳佰祿，〈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再發現」及其意義〉（2003）。

²⁷ 尾崎秀真於 1926-28 曾擔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囑託，1922-23，1929-33 兩度擔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1932 年又擔任總督府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

上推至四千多年前。他根據《尚書禹貢》關於貢品的記載，認為當時中國大陸是一個使用「子安貝」作為貨幣的文明，但作為經濟基礎的「貝幣」與其他重要物產在當時中國北方並沒有出產，因此必須靠有黑潮經過的沿海島嶼來提供，而合於上述地理條件又具有貝類加工傳統的文化，則非臺灣而莫屬。所以，根據這項論證，以及其他中日古籍上關於東方海上島嶼國家傳說的考證（如中國《山海經》的「蓬萊山」、日本浦島太郎漂流「常世之國」的傳說），他認為臺灣在四千多年前存在著一個發達程度上可比擬當時中國與埃及的高級文明。這個文明是以加工並輸出貝幣與織品而發達成為經濟的中心。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銅」取代「貝」成為貨幣的原料，使得因貝幣生產而發達的臺灣文明逐漸「退化」成為今日的臺灣。然而，雖然今非昔比，但是我們仍能從現生臺灣「蕃族」的身上，特別是泰雅族的貝珠衣與排灣族雕刻與琉璃珠文化，還有圓山貝塚中殘留的貝類加工遺物中，依稀遙見過去古文明的榮光。

不論贊不贊同尾崎秀真上述的歷史觀，但不可否認這樣的解釋可說是至今為止，最能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數龐大且種類龐雜的各種類型收藏納入一個完整系統的歷史解釋。在其中，原本看似無關的藏品，如歷史收藏的貨幣標本、圓山的貝塚、砥石，原住民泰雅族的貝珠衣、排灣族的琉璃珠等都在尾崎的架構下成為可以「被解釋」的物證，也就是說，它們的存在於博物館（成為藏品與展品）不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都是過去文明存在的證物）。同時，這樣的觀點也為現在島上各種人群（日本人、中國人、原住民）提供了「在場」的合法證明：透過中國的需求、日本的轉運²⁸與原住民的生產才創造出臺灣四千年的文明歷史。

1926年11月，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出版了它歷史上第一本展示內容的介紹：《臺灣博物館の手引》。這本介紹在內文中註明是由當時的館員松倉鐵藏所編著，尾崎秀真校閱。在歷史部的部分，其篇幅共佔了全書147頁中的65頁，比例不可謂不重。歷史部說明之下分為九個次單元：概說、臺灣古代史觀、臺灣的石器時代、關於貝幣貨幣、古代日本民族的南方關係、指掌型古磚相關考察、臺灣的文藝相關人物、近代日本人的南方經略、與明治時代的臺灣關係（其下又包括明治七年的臺灣討伐與領台當時的歷史兩個子單元）。各單元的內容或多或少，但很明顯地反映出尾崎秀真獨特的史觀，特別是在「臺灣古代史觀」單元中的「臺灣古代史綱」，更以日本、中國紀年並列的方式條列出臺灣歷史的大事記，自四千年前夏禹時期到康熙22年明鄭亡清為止。

在這本介紹中，歷史部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單元：臺灣的文藝相關人物。在這個單元內介紹的是清代的藝術文化與文人。雖然尾崎秀真以其獨特的史

²⁸ 尾崎秀真認為臺灣就是《日本書紀》中的「常世之國」，因此很早就與日本來往密切。

觀而著名，但他本身並不是一位受當時西方科學史學影響的歷史學者，而是受中國傳統漢學訓練的漢學家。來臺後，除了擔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囑託及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等歷史相關的職位外，也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編輯，與當時臺灣的政界、美術界、新聞出版界的文人來往密切，並彼此頻繁以詩文唱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對臺灣藝術界的情形與發展也自然極其熟悉與關心。也因此，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門在清代文人書畫的收藏展示多由尾崎秀真所指導並規劃，大部分這方面的藏品更是由尾崎秀真所捐贈²⁹。

架構在尾崎秀真史觀之下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到了 1930 年代又經歷了重大的改變。在 1933 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一版）中，歷史部的介紹已修訂為僅包括「高砂時代」、「荷蘭、西班牙時代」、「鄭氏時代」、「清領時代」與「領臺後」等五個時代單元。不僅尾崎氏關於臺灣作為古代貝幣生產的文明中心之說法全數遭刪除外，原列於歷史部的「臺灣石器時代」單元在此也被移至「土俗部」，成為「蕃族土俗」展示下的一個子單元。次年（1934），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再出版《昭和九年版博物館案內》（第二版）³⁰，其中「臺灣石器時代」又被移回至歷史部並改名為「先史時代」，加入原先歷史部的五個時代單元而成為六個單元。但原先屬於歷史部中關於臺灣漢人民俗與民間宗教的部分，則正式移至「土俗部」，成為其下三個單元（分別是「本島人土俗」、「蕃人土俗」與「南洋土俗」）之一。此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案內」（簡介）雖在 1937、1943 又經歷兩次改版，但歷史部展示的內容僅在細部上做調整與擴充，其基本架構仍完全延續 1934 年起確立的六個時代單元。

1933 年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展示的時代單元架構已如上述，那麼各時代單元中主要的展品包括哪些？表五列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出版的四版簡介（分別是 1933、1934、1937、1943）中歷史部主要的展品。

表五：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各版簡介（案內）歷史部陳列品比較表³¹

	1933 年版	1934 年版	1937 年版	1943 年版
先史時代	-	圓山出土石器、陶器、日本彌生式陶器	圓山出土石器、陶器、日本彌生式陶器	圓山貝塚貝層斷面、土器、石器
高砂	倭寇圖卷	倭寇圖卷	倭寇圖卷	豐太閣（豐臣秀吉）使用扇面

²⁹ 尾崎秀真對清代臺灣的藝術文化發展，也有一套獨特的看法，同時也可值得與其歷史觀相互對照參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書畫作品被歸類於歷史類也與尾崎秀真的觀點有關，但此議題較為複雜，也牽涉較廣，故待日後以專文討論之。

³⁰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兩度改版其簡介的原因可能是為因應 1934 年 11 月起所舉辦的第一屆「臺灣博物館週」。關於「臺灣博物館週」的活動可參見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1997），頁 256-258。

³¹ 為使中文讀者理解，表內的部分展品名稱已做了適度的翻譯。

	御朱印船（圖）	御朱印船（圖）	御朱印船（圖）	豐太閣（豐臣秀吉）高山國招諭文書
	（豐臣）秀吉の高山國招諭文	（豐臣）秀吉の高山國招諭文	（豐臣）秀吉の高山國招諭文	有馬晴信臺灣視察船掟書
	（有馬晴信）臺灣爭伐覺書	（有馬晴信）高山國遠征訓令	（有馬晴信）高砂國遠征の訓令書	臺灣渡航拋銀講文
		（有馬晴信）臺灣視察船掟書	（有馬晴信）臺灣視察船掟書	明人董伯起給村山等安書狀
		博多の末次家拋銀證文	博多の末次家拋銀證文	松浦隆信給唐人甲必丹書狀
				東洋諸國航海圖
荷蘭、西班牙時代	（荷）蘭人澎湖島上陸圖	（荷）蘭人澎湖島上陸圖	（荷）蘭人澎湖島上陸圖	熱蘭遮城圖
	熱蘭遮城圖	熱蘭遮城圖	熱蘭遮城著色圖	荷蘭時代安平港圖
	熱蘭遮城址圖	熱蘭遮城址圖	領臺當時的熱蘭遮城址	濱田彌兵衛劫持荷蘭長官圖
	安平附近地圖	安平附近地圖	安平附近地圖	蕃社戶口調查表
	普羅文西亞城正面復原圖	普羅文西亞城正面復原圖	普羅文西亞城正面復原圖	熱蘭遮城址
	赤崁夕照之圖	赤崁夕照之圖	赤崁夕照之圖	熱蘭遮城平面圖
	（傳教士）Gravius、Junius 肖像	（傳教士）Gravius、Junius 肖像	（傳教士）Gravius、Junius 肖像	熱蘭遮城煉瓦
	各蕃社戶口調查書	各蕃社戶口調查書	各蕃社戶口調查書	普羅文西亞城復原圖
	新港蕃語物價表	新港蕃語物價表	新港蕃語物價表	西班牙時代基隆附近圖
	濱田彌兵衛劫持荷蘭長官圖	漢蕃對譯契字	漢蕃對譯契字	羅馬字綴蕃語文書
	蘭領時代的基隆社寮島圖	濱田彌兵衛劫持荷蘭長官圖	濱田彌兵衛劫持荷蘭長官圖	北荷蘭城（聖薩爾瓦多城）砲臺城壁及溝口
		現英國領事館寫真	臺南古圖	北荷蘭城（聖薩爾瓦多城）出土之壺
		蘭領時代的基隆社寮島圖	現英國領事館寫真	
			蘭領時代的基隆社寮島圖	
鄭氏時代	蘭人代表二名與鄭氏會見交涉圖	蘭人代表二名與鄭氏會見交涉圖	蘭人代表二名與鄭氏會見交涉圖	鄭成功畫像
	巴達維亞城來援艦隊攻擊鄭氏軍隊圖	巴達維亞城來援艦隊攻擊鄭氏軍隊圖	巴達維亞城來援艦隊攻擊鄭氏軍隊圖	熱蘭遮城開城條約文（寫真）
	揆一所著「被遺忘的臺灣」（書）	「被遺忘的臺灣」（書）	「被遺忘的臺灣」（書）	寧靖王、鄭成功筆跡（寫真）
	施焯之像	施焯之像	熱蘭遮城開城條約文（寫真）	
	寧靖王之像	寧靖王之像		
	五妃之像	五妃之像		
清	臺灣古地圖	臺灣古地圖	臺灣古地圖	臺灣古地圖

	岸裡社與土目墩仔 畫像二枚	岸裡社與土目墩仔 畫像二枚	岸裡社與土目墩仔 畫像二枚	岸裡社土目墩仔衣冠盛粧與行樂之圖
	清朝臺灣土匪征討圖	清朝臺灣土匪征討圖	清朝臺灣土匪征討圖	岸裡社土目宅邸模型
	乾隆帝敕建臺灣平定碑文	乾隆帝敕建臺灣平定碑文	乾隆帝敕建臺灣平定碑文	林爽文平定圖
	(牡丹社事件) 歸順蕃社保護旗與模造旗	(牡丹社事件) 征臺軍進擊圖	(牡丹社事件) 征臺軍進擊圖	明治七年征臺役歸順蕃社保護旗
	(牡丹社事件) 士兵使用之) 飯盒	(牡丹社事件) 歸順蕃社保護旗與模造旗	(牡丹社事件) 士兵使用之) 面桶(飯盒)	西鄉(從道)都督陣中書翰
	西鄉(從道)中將書翰	(牡丹社事件) 士兵使用之) 面桶(飯盒)	(牡丹社事件) 歸順蕃社保護旗與模造旗	
	劉銘傳之筆跡	西鄉(從道)中將書翰	西鄉(從道)中將書翰	
	劉銘傳敷設之鐵路	劉銘傳像及筆跡	劉銘傳像及筆跡	
		劉銘傳敷設之鐵路	劉銘傳敷設之鐵路	
		古機關車「騰雲」	古機關車第一號與第九號	
領臺後	臺灣叛徒之國旗(臺灣民主國旗)	臺灣叛徒之國旗(臺灣民主國旗)	臺灣叛徒之國旗(臺灣民主國旗)	伊藤總理大臣訓令謄本
	劉永福諭示	劉永福像及諭示	劉永福像及諭示	臺灣授授公文原議
	能久親王澳底上陸(寫真)	皇軍澳底上陸寫真	皇軍澳底上陸寫真	樺山總督諭示
	樺山總督領臺諭示	臺北入城光景(圖)	臺北入城光景(圖)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澳底露營寫真
	兒玉元總督乘用之轎	能久親王澳底上陸(寫真)	能久親王澳底上陸(寫真)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基隆御舍營中寫真
		能久親王彰化城征討圖	三角湧血戰錦繪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臺北入城圖寫真
		樺山總督領臺諭示	能久親王彰化城征討圖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臺北駐營中使用寢臺
		伊藤首相訓示	能久親王使用之御寢臺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大肚溪畔戰線御視察圖
		兒玉元總督與後藤元民政長官銅像	樺山總督領臺諭示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各地遺蹟寫真
		兒玉元總督乘用之轎	伊藤首相訓示	領臺當時臺北地圖與各種寫真
			伊澤元學務部長官服	芝山巖與殉難六士先生寫真
			六士先生血染名刺	伊藤總理大臣筆蹟額面
			兒玉元總督與後藤元民政長官銅像	乃木總督夫妻遺墨
			兒玉元總督乘用之轎	後藤長官題解纏足獎勵圖
				兒玉總督軍服、轎、馬車

				各總督遺墨
其他				臺北練兵場出土之軛
				安平壺
				我國最初之機關車第九號
				本島最初之機關車第一號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昭和 8 年版、昭和 9 年版、昭和 12 年版、昭和 18 年版

關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 1930 年逐漸成形的歷史展示，以及展示背後所呈現的歷史主體，過去多項的研究³²均指出，所強調的是一個以日本為主的臺灣歷史。大量經過刻意複製（而非原件）的日本史料、影像、圖像、與文物，「錯落與其他高砂國、荷蘭、明鄭或清朝的臺灣文物（之中），作為日本在台灣過去的「在場證明」，彼此相串連成日人觀點的臺灣史」³³。不只如此，我們從表五中可以觀察到，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中的「日本在場證明」越來越多，表示日本人在台灣歷史中的角色越來越被突顯，而相對地其他族群（中國人、原住民）在歷史展示中的角色則越來越淡出³⁴。若是以這套展示史觀與 1920 年代尾崎秀真所主導的歷史展示觀點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在尾崎的史觀中，日本與臺灣歷史的淵源雖然也同樣被強調，但是歷史的主體卻是原住民與中國，只是整套尾崎史觀最終的指向卻是臺灣的「過去」：臺灣有著輝煌的過去，卻有著墮落的現在。但在 1930 年後的歷史展示中，歷史的主體已從原住民與中國轉移至日本，而其方向則是「未來」：臺灣雖有著悲慘的過去，卻有著光明的未來。

如上所述，在 1930 年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中「日台關係史」的文物有著逐漸增加的趨勢，而其他族群，特別是中國關係的文物則越來越淡出。但這並不表示中國相關的文物就自此退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展示之列。事實上，至少就收藏品（而非展示品）而言，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門中國（漢人）相關的收藏自 1915 年後仍舊有相當穩定的成長。表六為根據 1940 年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類藏品財產帳冊中「索引」部分所做分類藏品統計，各項類別後括號內之數字代表該類別藏品實際之數量。網點部分表示在 1915 年清冊中即已存在的文物類別。由表六我們可以看到，不論就藏品類別或是藏品數量，1940 年代的歷史類收藏較諸 1915 年左右，都有相當的成長。同時，除了具有明顯統治宣示意義的「歷史物證」，如戰利品、武器、旗幟、政治人物畫像、用品、寫真、歷史文告等之外，有關臺灣漢人民間風俗或信仰相關的文物仍不佔少數。這些歸類

³² 如王飛仙，〈在殖民地展示歷史：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1908-1945）〉，(2000)；廖靜如，〈日本殖民主義下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2003）；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2005）；李尚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研究 1908-1935〉（2005），

³³ 王飛仙，〈在殖民地展示歷史：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1908-1945）〉，(2000)，頁 138。

³⁴ 如從表五中我們可以看到，代表日本與臺灣早期接觸歷史的「高砂時代」，其主要展品自 1933 年的 4 件，至 1943 年已擴充至 8 件。而在代表中國統治臺灣的「清領時代」中，不只特別強調牡丹社事件相關文物之陳列外，代表中國統治的文物則從 1933 年的 6 件減至 1943 年的 4 件。

於「歷史類」之藏品並不是沒有展出。根據《昭和九年版博物館案內》(第二版)的平面圖,我們可以看到,有關臺灣漢人民間風俗或信仰相關的文物在展示上已從「歷史室」中切割出來,而被移至一樓與原來「蕃族」、與「南洋」的「土俗部」合併而稱為「本島人土俗」。

表面上看來,此項移展似乎只是博物館內部空間上的調整。然而,深究之下,卻可以發現此項移展也隱含著「展示策略」上的改變。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土俗」部門的展示,如前所述,基本上是一種「文化標本」式的陳列,反映出當時殖民地人類學所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觀看「他者」的觀點,其手段是區辨並強調「他者」與我群間的差異,並透過這種對「他者」差異的區辨以強調我群的特質。但前述歷史部門的展示,不論是 1920 年代尾崎秀真的「黃金古代」史觀,或是 1930 年代後的「日本中心」史觀,其基本的展示策略,或者說其展示的目的,卻在於「同化」(而非「異化」):藉著「歷史物證」的陳列展示,以說明並證明日本現在統治臺灣是有其歷史的淵源,換句話說,是證明日本與臺灣歷史的同一性。由此觀點來檢視 1930 年代臺灣漢人風俗品移置「土俗部」展示,其背後代表的意義也就再明顯也不過了。如果說臺灣的歷史被證明是為日本歷史的一部份,則其治下的中國與中國人,在喪失其臺灣歷史的主導性之後,也只能淪為日本帝國治下眾多「異族」之列,與「蕃族」及「南洋」的民族一樣,承受來自帝國對「他者」的凝視與詮釋。

表六：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40 年代歷史類藏品財產帳冊分類索引³⁵

イ部	ヨ部	コ部	セ部
衣服 (73)	雍正磁花瓶 (1)	戶口調查參加章 (5)	木碑 (2)
帷幕類 (1)	夕部	古印 (14)	木大杓 (2)
口部	臺灣舊度量衡器 (59)	皇清職貢圖 (2)	門示 (2)
ハ部	建物模型 (5)	古煉瓦 (6)	セ部
旗 (6)	短刀 (2)	交趾燒 (2)	石碑 (3)
馬具 (1)	臺灣常用茶器 (1)	兒玉總督遺愛之硯 (1)	籤器 (2)
ニ部	高砂時代關係古文書寫(23)	工部	石器 (600)
日本人種模型 (1)	拓本 (37)	煙管 (4)	石鏟 (50)
日露役戰利品 (12)	レ部	テ部	石棺 (3)
日清役戰利品 (13)	聯 (18)	點字打字機 (1)	(新增)
ホ部	歷史畫 (9)	天龍寺青磁香爐 (1)	芝居人形 (1)
本島人風俗人形 (12)	歷史關係地圖 (7)	キ部	人形芝居舞台 (1)
帽 (17)	ナ部	銀製竹筏模型 (1)	祭祀供物 (11)
鉾槍類 (3)	南蠻珠 (25)	行啓紀念物 (6)	守札 (10)
ト部	ノ部	鉛青磁香爐 (1)	鼻藥壺 (6)
圖書 (11)	乃木大將筆蹟扇面 (1)	轎模型 (1)	祈禱具 (1)
頭髮模型 (9)	乘物 (2)	シ部	牡丹社討伐關係古文書寫 (2)
刀 (2)	オ部	舟筏模型 (5)	支那事變戰利品 (35)
銅像 (1)	和蘭古文書寫 (3)	神像 (11)	
陶瓷器類 (104)	ク部	寫真 (108)	
度量衡器 (92)	貨幣標本 (249)	肖像 (2)	(已註銷)
チ部	車模型 (2)	支那古刀 (1)	佛蓋 (1)
彫刻物 (1)	靴類 (7)	七官青磁花瓶 (1)	婦人耳飾 (4)
銃 (1)	廣西青磁香爐 (1)	七寶花瓶 (2)	皿 (平戶皿) (1)
抽籤器械 (1)	ヤ部	暹羅青磁 (6)	
著裝 (25)	槍 (0)	震災燒土塊 (1)	
カ部	マ部	古文書 (167)	
掛軸 (63)	勾玉 (1)	ヒ部	
額面 (29)	ツ部	飛行機及附屬品 (24)	
繪畫 (2)	圖卷類 (2)	飛行機螺旋槳 (1)	
甲冑 (2)	フ部	皮革製品 (1)	
鏡 (1)	不用官印 (16)		
樂器類 (20)	古太鼓 (1)		
	佛具 (7)		

說明：1.各項類別後括號內之數字代表該類別實際藏品之數量。

2.網點部分表示在 1915 年清冊中即已存在的文物類別

³⁵ 本表大體依據該本財產帳冊前所附的「索引」格式，但有部分類別，如表中列為「新增」及「已註銷」的部分，則是根據清冊內容所增加。另外，部分類別在「索引」中的名稱與清冊內使用的名稱有所出入，在本表中一概改為清冊內使用的名稱。

五、結論

在傳統的印象裡，博物館是收藏保存歷史、並展示呈現歷史的機構。但是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因此，藉著探討「博物館物品」在不同時代如何被收藏、被利用與被展示的歷史，可以透露出不只是該博物館，同時是該博物館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重要的訊息。本文的目的，即以上述的角度，觀察並檢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品性質上的變遷，以及各類藏品在不同時期其收藏與展示是如何以及為何改變的歷史。

作為一個日治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並以臺灣為主要收藏對象的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各類藏品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消長不一的情形：某些類別的藏品在某個時期完全消失了；新類別的藏品在某個時期開始出現；即使一直存在的類別，有的固然保持逐年穩定的增長，但有的卻逐年增減不一，甚至也出現「時有時無」之情況。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本文認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品在不同時期的消長，固然有其個別或偶發的內在因素（如館長逝世或新收藏機構的成立），但社會/政府對博物館角色定位的轉變也無疑是其中一項關鍵的因素。

西元 1915 年可說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面臨轉變的一個關鍵年份。這一年的 8 月 20 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新公園的館舍：「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但在同一天首任館長川上瀧彌卻因過勞而去世。館長川上瀧彌的去世實質上終結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自 1908 年成立以來以自然科學（標本）的調查收藏與其應用並重的傳統，也使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角色從強調「臺灣自然資源的獨特與珍貴」與「自然資源可被人類馴化的潛力」轉變為關注「自然加工物的可交換性」的產業商品陳列。到了 1920 年後，隨著總督府在教育「同化」政策的確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被改編隸屬於社會教育的部門，「關於自然的科學」—強調人類如何發現、理解與利用自然的知識與技術，乃逐漸被「統治的文化技術」—如何藉由「文化產物」的收藏與展示以建構符合統治需要的文化論述，所取代。反映在收藏上，則是自然標本收藏的日漸萎縮，而代表文化產物的收藏（歷史類、與「蕃族」類與「南支南洋」）卻日益增長。

1920 年代後，歷史與「蕃族」逐漸成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兩大主流，但兩者卻運用了相當不同的展示策略，只是在目的上卻也是殊途同歸：呈現日本殖民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在「蕃族」展示的部分，所採用的是一種「文化標本」式的陳列，反映出當時殖民地人類學所發展出的一種特殊的觀看「他者」的觀點：藉著族群細部的分類與物質文化類型的區辨，原住民不再是一群印象籠統的「生蕃」，而是七至九群擁有各自名稱與文化特色，可被理解也因此可被治理的「蕃族 s」。同時，透過博物館對「代表性」器物的展示及展示技術（如

地圖、大型玻璃展示櫃)的運用，原住民與我族間的「差異」(如野蠻、落後、嗜殺)因此在博物館中被具體地放大與強調，不只對照出殖民者的「文明」優勢，也滿足了一般觀眾獵奇好異的心理。

如果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蕃族」展示基本的策略是強調其異的「異化」(exoticizing)，則其歷史展示中就是運用了「同化」(assimilating)³⁶的策略。但是在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的同化策略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對於尾崎秀真在 1920 年代所發展出來的歷史架構而言，歷史展示的目的在於說明臺灣的「過去」：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但中國與日本也深涉其中的輝煌過去。但到了 1930 年代以後，在歷史展示中雖也強調日本在臺灣歷史中的角色，但其方向不再是說明「過去」，而是承諾(日本統治下)「未來」，至此臺灣歷史乃「同於」日本的歷史。也因此，原住民與中國的角色在歷史展示中逐漸淡出，終而導致 1930 年後臺灣漢人風俗品全然退出「歷史」的展示，而移置「土俗部」與「蕃族土俗」、「南洋土俗」並列，承受來自日本帝國對「他者」的凝視與詮釋。

總之，在這一部臺灣總督府博物收藏與展示的生命史中，不同藏品經歷了有如生命階段的消逝或成長，反映出歷史過程中臺灣總督府博物在社會中角色的轉變與更動。從「自然標本」到「商品」到「文化產物」，不同時代對博物館的收藏各有其著重與強調。而歷史與原住民收藏與展示更於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在這個演變的過程中，與其說其呈現了臺灣的族群與歷史，不如說它們反映了一個更深刻的歷史過程：他者是如何被我群所建構，過去是如何被現在所創造。

³⁶ 關於異文化展示「異化」與「同化」的策略，參見 Ivan Karp, 1991。

引用書目

- 王飛仙
2000 〈在殖民地展示歷史：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1908-1945）〉，《政大史粹》，2: 127-145。
- 李子寧
1997 〈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 241-270。
- 李子寧、吳佰祿
200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再發現」及其意義〉，《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1: 52-75。
- 李尚穎
2005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研究 1908-1935》。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紹理
2005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
- 伊能嘉矩
1896 〈臺灣通信（第二回）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
1900 《台灣蕃人事情》，臺北：南天書局。
- 松倉鐵藏
1939 〈博物館勤務當時 思 出 希望〉。《創立三十年紀念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頁 373-375，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 松倉鐵藏（編著）、尾崎秀真（校閱）
1926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の手引》。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 邱文鸞、劉範徵、謝明珂
1915（1996）《臺灣旅行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文獻叢刊第 211 種。
- 陳奇祿
197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臺灣土著研究〉。《臺灣風物》24(4): 7-24。
- 丙牛生(森丑之助)
1912 〈蕃族標本 陳列 就〉，《台灣時報》31:3-6。
- 尾崎秀真
1925 〈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一～八），《台灣時報》65-72 期。
1926 〈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台灣時報》84 期。

- 1939 〈總督府博物館 思 出〉，《創立三十年紀念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頁 357-363，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廖靜如

- 2003 《日本殖民主義下之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素木得一

- 1939 〈博物館創設當時 顧 〉。《創立三十年紀念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頁 399-279，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歐陽盛芝、李子寧

- 1999 〈博物館的研究：一個歷史的回顧〉，《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李子寧主編，頁 114-189，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

- 193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一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34 《昭和九年版博物館案內》（第二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39 〈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座談會（記錄）〉。在《創立三十年紀念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頁 382-422，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1943 《博物館案內》（第四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編）

- 1937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三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

森丙牛生(森丑之助)

- 1936 (1925) 〈臺北博物館 思 出〉，《科學 臺灣》，4(2): 51-62。原刊於《實業之臺灣》，大正十四年九月號--十二月號。

Karp, Ivan

- 1991 “Other Cultures in Museum Perspective”, in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pp. 373-385.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How museum represents “History”:
the History Collections and Exhibitions in the Governor’s Palace Museum

Tzu-ning Li

Colle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bstract

By definition, museum is an institution of collecting and displaying objects. Yet, the ways of museum collect and display objects are also products of history. Drawing o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Taiwan Governor’s Palace Museum(TGPM), the most important museum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of Taiwan, the present paper trace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major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s in the TGPM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and why they changed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its 36 years’ history, the number of collection from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TGPM fluctuated at different period, reflecting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museum at different times. From 1908 to 1915, the natural specimen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prevailed, stressing the uniqueness and preciousn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aiwan, and their potential of being domestication. From 1915 to 1920, the concern was transformed into commodity, emphasizing their exchange value. Since 1920, the concern about nature and commodity was replaced by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rule.

After 1920,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on history and aborigines has become two major focuses in the TGPM. While the two utiliz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displaying, in the end they served the same purpose: to justify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he aborigine’s exhibition, artifacts were display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developed by the colonial anthropology. The exhibiting strategy is thus exoticizing: stres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borigine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history exhibition, on the other hand, utilized assimilating strategy: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 connec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while excluding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nd aborigines,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removal of Han folk artifacts from the history exhibition to the folk section. In conclude,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of the TGPN show not so much what Taiwan really was, but an example of how the others were constructed by our group, and how the past was created by the present.